

作编之间——我的学报缘

刘范弟

198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到长沙水电师院政史系工作,直到2013年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退休,我和学报的关系可谓密切。先是学报作者,后来成了学报编委,再后来调入学报当了责任编辑,即使当了编辑,写了自认为还算过得去的文章,我还是愿意在自己编的学报上发表,并未想到避嫌。我在长沙理工大学(包括其前身水电师院和电力学院)工作整整二十六年(后十六年在学报),我和学报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作者和编辑二者兼具的关系。我见证了学报从幼年到青年到壮年的成长,我亲身参与了学报大部分的成长过程,于我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如今我退休已整整八年,在学报创刊35周年之际,应学报主编浩凯教授要求,写下我与学报之间的点滴杂忆,零碎拉杂,雪泥鸿爪,毕竟来过当时此处,也算不悔当年。

—

读研究生前,我是沅江一个偏远乡镇(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中学教师,从未写过什么论文;在陕西师大读研究生,我上的是两年制的研究生班,毕业时不授学位,也没有非要发表论文才可毕业的规定和压力。我个人比较懒散,读研期间除了在《光明日报》“大学生回乡见闻录”征

文中发过一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外,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学术文章。我们也有学期论文的训练,也有一两位同学在学术刊物上发过文章,我也曾投过一两次稿,但却没有中过,当然是文章的学术和文字还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缘故。业师黄永年先生当年同时招有几个三年制的研究生,他对我们两年制的同学很关心,告诉我们只要提交学位论文,毕业后的次年就可以申请参加答辩,只要答辩通过,我们就可以和三年制的同学一起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课程已经不多,我与其他几位两年制的同学一起,各自选定了一个论文题目,到毕业前夕,我的学位论文已基本完成,并送导师审阅认可,毕业后继续充实修改即可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

来到长沙水电师院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系里没给我安排上课和其他工作,我得以专心修改学位论文。当时《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刚创办不久,我在系资料室看到新出的学报,上面登了一篇我同教研室年轻老师陈西平的文章。我想我也可以试试,于是就将学位论文中的一节整理整理,到学报编辑部当面交给了编辑老师。

接待我的是一位叫李一平的年轻编辑。他是湘乡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厦门

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在《青海社会科学》编辑部担任编辑,不久前刚调回家乡,来到《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工作,也算是一位资深编辑了。

文章很快就在学报发表了,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然是很高兴的,况且还有稿费,超过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一年多后,李一平要调往厦门大学,我到他宿舍,与他话别送行。他告诉我,当初定稿会上,主编对我那篇文章是有异议的,认为文章讨论一部罕见古籍,与现实无关,没有多大意义;他据理力争,古籍是古代文化遗产,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只要是认真独立的研究,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有发表的价值。我自知文章还不成熟,文章能够在学报发表,一方面要感谢李一平的力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学报主事者发扬学术民主,不搞一言堂,充分调动发挥责任编辑主观能动性的民主开放作风。这其实是《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从起步开始,就能够不断向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后的两年多,我在学报发表的文章,都是由章惠康老师编发的,我在益阳师专中文科读书时,他曾给我们班上过古典文学课,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章老师调来长沙水电师院后,先是在中文系,大约李一平走后不久,又来到学报担任副主编。他是一位真正的资深编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曾在《人民日报》下属的画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益阳师专创办学报,他也是早期的主要编辑人员。他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对我非常关心。他组织《三国志今译》《后汉书今译》两个大规模的古籍整理项目,参加者有益阳、娄底、长沙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承蒙他关照,我也在其中担任了部分工作,这使我阅读研究古籍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章老师编发我的

稿子,遇到文字或内容不妥有疑之处,并不直接删改,而是把我叫到编辑部或者家里,当面与我商讨修改,让我明白为何此处不妥,应该如何修改,这使我写作和审阅文章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我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温庭筠生平的考证文章在学报发表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辑全文转载。河北大学一位学者对拙文引用的一段文字出处提出质疑,将质疑文章寄给了学报。章惠康老师审阅后,认为虽有道理,但不是什么关乎文章主旨的问题,就没采用此文。事后章老师把我找去,将那篇质疑文章的复印件交给我,告诉我那篇文章的质疑还是有道理的,今后写文章对引文一定要弄清原始出处,不能怕麻烦而从别的文章或著作中转引。章老师的告诫,我的研究生导师黄永年先生给我们上课时也讲过多次,还以一位著名国学大师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转引《魏书》原文的例子告诫我们决不能偷懒取巧,没想到我一时偷懒从号为“一代词宗”大师的著作中转引的《全唐文》文字出处竟然有错。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从此,我对引文的核对,再也不敢偷懒大意。

1992年,章老师离开学报回到中文系,从此我在学报发表的文章就由李传书老师负责编发。李老师只比我大几岁,我称他“李哥”,将他当兄长看待。我和他都是从农村出来,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说话随便没有什么顾忌。我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他会直接指出不留情面,我觉得他不对也会直接反驳,完了哈哈一笑握手言欢。这真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兄弟关系!

二

到1994年,我已在学报发表了七八篇文

章,其中两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于是我被学报列为重点作者,每年可以在学报发表一篇或两篇文章。九月开学,学报编委会换届,不知是谁提名推荐,我这个仅有讲师职称的作者竟忝列为第四届学报编委会委员,而十位编委中的其余九位,全都是教授或副教授。这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其实编委就是一种虚衔,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和利益,只是可以参加编委会议,在会上发发议论提点建议而已。我记得参加过两次编委会。一次讨论学报如何办出特色,可以开设些什么新的栏目,有人建议从地域文化入手,多发些有关湖湘文化的文章,但要与师大、湘大学报争锋,难以异军突起;有人说可以注重行业特色,办一个电力企业文化的专栏,但却过于局促,难有大的腾跃;还有一些别的建议,议来议去,当场却无定论。又一次是讨论学报改名,也是议论纷纷无结果。从我参加的两次编委会来看,编委会开会虽然效率不高,但各专业的编委们议论蜂起互相争论,各种想法纷呈,可以集思广益,对开阔办刊思路是有好处的。

1995年6月,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我任讲师已有五年,可以正常申报副教授了。我在学校社科部历史专业担任专业课教学,发表的学术论文全都是有关中国古代史和湖南地方文化方面的内容。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省部级课题,清点了一下发表的学术成果,能拿得出手的除了一篇《光明日报》专栏《文物与考古》上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及一篇《湖南社会科学》上8000字的文章外,就只有学报发表的9篇论文了。我信心不是很足,但还是准备材料积极申报。社科部和学校的评审顺利通过,但省里的评审我不敢大意,就与社科部另一位申报教授的老师一起去找了一位多次当省高评委的老

师。省评审顺利通过后,那位省高评委老师告诉我,你是全票通过的,其实根本不用我帮你说话,就凭你那两篇学报发表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文章和《光明日报》上的那篇,还有你以讲师身份担任本科院校学报编委的经历,评上副高就绰绰有余了。

学报几年来对我的扶掖,使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学报真是我的贵人,我能评上副教授,学报功莫大焉。

三

长沙水电师院社科部的历史专业从1989年开始招生,由于学生就业形势不明朗,1993年停止了招生,前一年所招学生在历史专业学了一年后转入中文专业。1995年,历史专业最后一届学生毕业,这个办了6年的专业就此撤销。我随历史教研室的专业老师一起,转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改教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第二年,教研室主任张可荣升调学院宣传部任副部长,社科部主任唐秉仁找我谈话,要我接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我生性闲散,不愿去当这个又忙又不讨好,还耽误自己看书做学问的差事。唐主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我不堪烦扰,就提出条件,我顶多干一两年,到时另让高贤;还有,我对教中国革命史等思政课缺乏兴趣,因为不能随意放开讲,照本宣科不合我的心性,况且我的兴趣和着力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和湖南地方史,教革命史也是赶鸭子上架,有机会我还是想换一个单位或部门,到时希望不要留我。唐主任答应了我的两个条件,我不好再推辞,就勉为其难地上任了。

1995年廖小平接替陈其相担任学报主编,后来学院又委任他为学工部长,身兼两个都须亲力亲为的重要岗职,学报的工作就有些忙不

过来了,学报急需增加一位编辑才行。廖主编与我早就相熟,我也早有离开社科部的意愿,于是一拍即合,1997年10月,我调入学报当了编辑。这编辑我一当就是16年,其间经历了4位主编,成了四朝元老,直到退休我才离开了学报编辑部。

我到学报的时候,正赶上了学报发展的最好时期。前两任主编靳绍彤和陈其相为学报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廖小平接任主编后,更是雄心勃勃,决心要向全国高校学报先进行列冲刺。廖主编年轻,有干事业的雄心壮志,学术过硬,业务精通,学界交往广,有想法有干劲,从普通编辑做到主编,完全是凭实力干上来的。他当主编后短短两三年时间,学报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全国高校学报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学报影响力提高的明显标志是转载率的大幅提高,这里仅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例。1994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报文章15篇,1995年27篇,1996年30篇,而当时学报每年的发文量并不多,如1996年是118篇,而当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全文转载就达到了26%。如果再加上《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和其他文摘的转载转摘,这年学报文章转载转摘率达到了50%以上,这个成绩在当时的全国文科学报中都是居于前列的。那几年学报的《哲学》栏目,其转载率甚至达到了与《哲学研究》并驾齐驱的地步(据当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光明日报》发布的国内刊物复印转载排名)。正是由于学报影响力的提升,1999年9月,在由国家教育部批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组织的全国首届高校百强学报评比中,《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荣获“全国百强学报”称号,且排名在第26位,这个排名甚至超

过了全国许多重点大学的老牌学报。

学报为何能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今年是学报创刊35周年,已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当年学报主编的廖小平教授写了一篇回顾文章,对此总结概括了五点:一是学报办刊定位于“纯学术”,选题不拘一格。二是严格以质取稿,内稿外稿一视同仁。三是主动向名家约稿。四是坚决不收版面费,坚持发稿费。五是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有一种事业自觉和办好学报的荣誉感。

廖校长的总结概括非常到位。这里,我仅从个人体验和责任编辑的视角对其中“严格以质取稿”和“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积极性”两点稍作具体阐发。

当时我们学报的编辑人员都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在各自的学科专业方面,都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因而几位编辑人员都是各自负责自己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稿件处理。这些稿件很多是编辑主动约稿,也有不少自然来稿,当然也有朋友熟人的稿件,学校领导和学校其他部门领导以及校外兄弟学报介绍的稿件也是常有的。廖小平主编规定了“以质取稿”的总原则,至于约稿,处理自然来稿、朋友熟人稿和其他关系稿,则充分放手,由责任编辑自己负完全责任,只有一条,拟发稿件质量必须达到发表要求。在这样的机制下,责任编辑有权有责,权责分明,有压力也有动力;虽然也没规定什么奖惩措施,但你编发的文章不能老是没有反馈啊!你要想办法去约来好稿,你要能从自然来稿中发现好稿,你不能仅凭来稿人头衔决定稿件取舍,你还要顶住压力,拒绝达不到发表质量的各种熟人关系稿件和领导介绍的稿件。

责任编辑要对所有稿件进行初审,再对拟用稿件和某些由主编交下的稿件(廖小平主编

也要作为责任编辑负责某些学科方面的稿件,他收到非本人所编学科的稿件则交给相关编辑(审稿)进行精细复审,写出审稿意见,说明拟用或不用理由,再将复审后的稿件交给廖主编终审;廖主编终审完后,还要召集所有编辑开定稿会,讨论拟用稿件最终是否可以发排。

这样的定稿会不是走过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时还是非常热烈甚至激烈的。常有你拟用的稿件被主编或其他编辑质疑的情况发生,你要有理有据地说明稿件确实达到了发表要求,而不是你出于关系和压力而怀有私意的言不由衷;即使是廖主编交下的稿子,如果达不到发表质量被你否决,只要否决的理由确实充分,他也不会要求一定通过发表,我就曾经否决过一篇廖主编交我编审的历史稿件;我还从自然来稿中发现采用了好几篇在校研究生的来稿,如湖南师大一位叫刘苏华的研究生曾寄了一篇世界史的稿件,我审阅后觉得有新意质量不错,就写了“已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发表”的审稿意见,定稿会上廖主编问了几句,听我说了详细意见后当即决定发表(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就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专辑转载。刘苏华后来告诉我,完全没想到在不认识学报任何编辑,也没有任何人介绍推荐的情况下,他的初次投稿竟会顺利发表并被复印转载,他毕业后能留校当上学校出版社编辑,这篇文章起了很大作用)。可见当时我们学报编辑部确实洋溢着一种和谐向上、生动活泼的学术民主气氛。这是我们学报当时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并进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先进行列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四

1999年,廖小平教授担任学院学工部和教务处合并组建的教学部主任,工作太忙,无法再

兼任学报事务,于是辞去了主编的职务。

其时长沙电力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刚刚上任,学校机构正在进行变动整合。学工部教务处合组为教学部、宣传部统战部合成宣统部、人事处劳资处并为资源部,而我们学报社科版、自科版、《实验教学与仪器》三个期刊,则合并组成了期刊社,社长由学报自科版主编李应求教授兼任。期刊社为处级单位,三个本来也是处级的下属期刊于是降为科级。

期刊社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学报社科版主编暂时缺位,由副主编李传书主持学报工作。因李传书不是党员,任主编不合适,于是学院党委就任命已满58岁,刚从社科部主任位置退下的唐秉仁教授到学报社科版担任主编。

唐教授只差两年就退休了,对他而言,来学报当这个科级主编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一切学报事务也就“萧规曹随”了。这个状况其实还不错,责任编辑继续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各自所管栏目倒也能够自主,照旧组稿约稿审稿。然而每期的定稿会却不再开了,大家把各自审稿认为可用的稿件交给唐主编,由他安排上稿先后次序。在唐主编主事学报的那两年,学报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也基本保持了原有态势,没有大的下滑。

在此期间有一事可记。期刊社社长李应求曾在武汉大学做过一段博士后,他一个武大历史系的博士后同仁,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近代以来为何落后于西方的文章,托他想在我校学报发表。李应求不好推托,就将文章交给了唐秉仁,唐秉仁交我审阅。我拜读之后,觉得此文了无新意,所论全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东西,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并无发表价值。过了几天,李应求问我可否发表,我将我的意见告知,他有点为难说不好对作者交待,我说会写封信给作

者说明理由,不会让他为难的,此文到底没在学报发表。由此事可见,唐秉仁教授当学报主编时,即使期刊社社长管着学报,学报社科版责任编辑处理稿件的权责,还是得到了充分尊重的。

2002年元月21日,长沙电力学院院务会议讨论“唐秉仁教授已办理退休,期刊社要求免去唐秉仁主编、李传书副主编职务,由王新生担任主编”一事,讨论后学院同意了期刊社这个要求,王新生副教授接任《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此后不久,李传书教授离开了期刊社和学报,回到中文系从事教学。

王新生与我是社科部革命史教研室的同事,当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他比我早一年调入学报当编辑。王新生很年轻,也很努力。他很早就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工作之余还锲而不舍地全力备考法学博士,当主编后仍未放弃,终于考上了武汉大学在职博士。读博期间,他非常辛苦,既要履行主编职责,又要读书写论文,其间有一年时间都在武汉大学住校学习。

2002年3月,长沙轻工业专科学校并入长沙电力学院,该校的谢明子老师来到学报社科版,成了我的同事。谢老师二十多岁,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原在轻专校报和《创造天地》杂志社当编辑,有编辑职称。李传书教授已回中文系,此时的学报,就是我、王新生和谢明子三人了。

学报编辑事务的风格,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的责任编辑负责制不再实行。除了法学稿件和少量的历史稿件,几乎所有的来稿都由校内或校外的专家审稿,每期的定稿会也再未开过。这其实是学术期刊的惯例和发展趋势,或许也是正确的。当然,历史方面的稿件,如果有熟悉的学者和专家直寄(交)于我,质量也过得去,我向主编推荐,也还是能够采用的。

2010年8月,王新生去美国访学一年,学

校按规定免去了他的期刊中心副主任和学报主编的职务,陈浩凯教授由社科规划办主任转岗调任期刊中心副主任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陈浩凯是长沙水电师院中文系首届学生,毕业后留校,曾在学院办公室、学院子弟学校教务主任、社科办主任多个岗位历练过。他思路宽,想法多,事业心强,干劲足。虽然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编辑出版工作,但他善于学习,很快就熟悉了业务,进入角色成为行家里手。在对学报二十多年办刊经验得失和全国学报界现状初步了解把握之后,陈浩凯主编提出了自己的办刊思路。

他认为,学报用稿不能面面俱到,应该突出学校优势学科,形成拳头产品。为此,从2011年开始,陈主编在学报建立了“专栏特约主持人”制度。以研究方向设置栏目,以研究问题组织稿源,利用学校文科院系优势学科,创办了两个特色栏目,聘请学科优秀专家为栏目主持人,为栏目组织稿源,在全国范围内向知名学者约稿,并为稿件质量把关负责。

一个是由原文法学院教授、湖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易彬主持的《中国诗歌研究》栏目,2013年我退休时就办得很有起色了。浩凯教授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这个栏目已出版40多期,发表论文130余篇;2019年,学报将栏目文章择优,结集出版了《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百年新诗研究论集》一书。

另一个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易显飞教授主持的《科技哲学研究》栏目。至今已出版60多期,发表论文近300篇;2017年8月,学报将栏目文章择优,结集出版了《当代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2019年“科技哲学研究”栏目获评“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

学·2019版)》报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合影响因子0.824,在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科类别436种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全国第60位,影响力指数排名全国第99位。

在当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强手如林的情况下,陈浩凯主编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五

有人说,当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不是一份值得从事的工作。我不这么认为,编辑于我,不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在编辑工作中我更多的是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工作的快乐,收获可谓多多。十六年的编辑生涯,我至今无悔。

学报编辑,第一要事就是读稿,这不简单,极考验编辑的学识、逻辑思维和文字工夫。不管是名家大腕还是初生牛犊,他们的来稿都要认真地读。读稿,一方面是学习欣赏。文章内容有新意、论证清楚、逻辑严密、文字赏心悦目,益我心智,长我见识,读这种文章真是如饮甘醇!且这类文章将经我手变为铅字,公诸学界世人,这是何等快事!读稿,另一方面也是“挑剔抓虫”。学术新手文章固然有“虫”能抓,学术大牛文章也难保无“刺”可挑。从内容到结构,从论点论据,从逻辑条理到文字表达,对文章全面审读,常常会从文章中抓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各种“虫子”,挑出各种各样的“毛刺”。这样读稿之后,就可形成编辑的审稿意见了。如果决定采用,文章或要修改,编辑要和作者通气,将修改意见告知;如果不能采用,也常要通知作者,并告知不能采用的理由。读稿、审稿、与作者通信,这都是极考验编辑学识功夫和工作态度的事情。

我当学报编辑的前几年,那时还没有“伊妹儿”,通信往来全是手写邮寄,费神费力。至今

我还保留着不少作者给我的回信,不时翻阅,想起当时情形,常常会心一笑。如我曾觉得一篇文章标题不好,建议作者改为某题,文章刊出后,作者来信说:“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您对我文章标题的中肯意见,远胜过一字之师。”

后来用电话,又用电子邮件,方便快捷多了。一位党校作者,年轻的副教授,寄来一文,颇有新意,论证、文字大体合理平顺,唯开头一段引语,啰嗦不得要领。决定采用,打作者电话,希望改改,作者气盛,说其常给党委和政府领导写稿,没有谁说他文字不好的。我也不多说了,将其文章开头改改,电子邮箱发给作者,两天不见回复。第三天作者来了,提着一袋苹果,进门就说谢谢,说我这一改,提纲挈领、明白晓畅,让他文章增色不少;坐下相谈甚欢,从此成了朋友。

又一次,兄弟合作单位(外校)送来一稿,作者是位教授,来头不小,且有领导交待,文章是非发不可的。然而文章所论,都是老生常谈,且文字水平也差,逻辑混乱,好几个段落都是上气不接下气,是硬生生横插进来,不知要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叫来作者本人,当面向其指出问题,问她这段与上段和下段的意思如何连接?作者态度倒还诚恳,耐心听我一一指出要改之处,答应回去好好修改。过了几天,将稿件送回,我看了看,确实大改了,至少逻辑上平顺了很多,我如实写了审稿意见,主编于是签字同意发表。

组稿约稿也是编辑的重要工作。这使我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其中很多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切磋提携,从而使我有了更多的学术长进和学术机遇。这些专家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有福建师大博导戴显群,有华南师

大博导曹旅宁,有重庆师大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所所长刘俊男,有湖南师大博导饶怀民,有岳麓书社社长、湖湘文库编委副主任夏剑钦,有湖南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万里,有湖南社科院炎黄研究所所长何光岳,有船山学社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朱迪光,有濂溪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有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张文刚,有湖南城市学院教授易永卿,等等。他们都由我约稿,在我校学报发过文章,有的还发过好几篇,文章都有不错的反响,为我校学报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还有一事值得一叙。大约是1999年4月的某天上午,我和王新生两人在学报办公室看稿,学院副院长洪源渤走了进来。他并不分管学报,王新生搬过一张椅子让他坐,他也不坐,就那么站着和我们说话。他说,前段时间托人送来一篇稿子,不知这期能上么?我们前几天刚定了第二期的稿件,正准备送印刷厂发排。王新生就查了查,说没上呢,要排到下期了。洪院长有点犹犹豫豫,欲说又止的样子,最后说:“哎,只怕来不及了,马上要报职称材料了,算了算了。”说完这话,他就坐下和我们聊了会天。

知道我是刘范弟后,他就问我去年(1998年)是否在《真理的追求》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党办给院领导都订了一份这个杂志,并说我的文章不错,很有现实意义,就起身走了。我和王新生也没多想什么,继续看稿。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年春节,我是在安化父母家过的。回长沙后,独自留在长沙过年的大女儿告诉我,大年三十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我拜年,是一个叫洪源渤的人打的,知道爸不在家,还特意叫我一定转达他的问候。我有点意外和感动,我们当时没主动帮他上稿,没想到已升任电力学院党委书记的他竟会大年三十给我这个普通编辑打电话拜年!这在其他地方和单位,只怕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洪源渤书记的亲民、民主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六年阳光风雨,我与学报一路同行,退休已八年,几度梦里回。难忘的记忆还有好多好多,拉拉杂杂记下这些片断,暂且打住,以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三十五周年贺。长江后浪推前浪,祝学报乘九万里风,鹏翼高展,金色梦翔齐云飞。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编审)